

张 铚 年 谱

曾维刚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张铤年谱

曾维刚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镃年谱/曾维刚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

ISBN 978-7-01-008691-0

I. 张… II. 曾… III. 张镃(1153~1235)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2413 号

张镃年谱

ZHANGZI NIANPU

曾维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266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08691-0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言

张铤(1153—1235),字时可,后改字功父(又作功甫),号约斋,家本成纪(今天水),寓居临安(今杭州),乃宋南渡名将张俊曾孙,刘光世外孙,家世显赫;尝历直秘阁、临安通判、司农寺丞、太府寺丞等职,在宁宗朝声援北伐,复与史弥远等谋诛伐金失败的韩侂胄,后忤史弥远而贬死象台,是南宋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张铤又为宋末著名诗词家张炎曾祖,是张氏家族由武功转向文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张铤不仅是海盐腔创始人,并以诗词享誉于时,为南宋中兴期著名作家,诗文著作甚丰,今存《仕学规范》四十卷、《南湖集》十卷^①、《玉照堂词》一卷、《玉照堂梅品》一卷、《四并集》(一名《赏心乐事》)一卷、《桂隐百课》一卷等。张铤交游极为广泛,举凡当时朝野政要如史浩、萧燧、洪迈、周必大、姜特立、京镗、楼钥等,道学大宗如朱熹、陈傅良、吕祖俭、彭龟年、陈亮、叶适、蔡幼学等,文坛名家如陆游、杨万里、尤袤、范成大、辛弃疾、姜夔等,均与之有往来唱酬。杨万里称:“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②。杨万里所说的“南湖”即指张铤,因张铤在

① 张铤《南湖集》为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然传本极罕,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元修《宋史·艺文志》均未见著录。明初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著录“张约斋《南湖集》一部五册”。明人叶盛《菉竹堂书目》亦载有五册。至明万历中张萱编《内阁书目》已不登录。今存《南湖集》十卷乃清代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著录《南湖集》十卷。

② 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四一《进退格,寄功父、姜尧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90页。

杭州城北郊有当时闻名遐迩的别业南湖园^①。而所谓“白石”，则指姜夔。杨万里将张镃誉为追步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等人的诗坛健将，并以之与姜夔齐名，对其推崇备至。宋元之际，方回云：“乾、淳以来称尤、杨、范、陆，而萧千岩东夫、姜梅山邦杰、张南湖功父亦相伯仲”^②，也认为张镃与尤、杨、范、陆等中兴四大家差堪比肩。

然而《宋史》未为张镃列传，宋元之际见存的张氏世谱亦失传^③，其生平事迹遂湮没不详。今各种传记资料、诗词文集及相关论著对其生平事迹有所辑考，但迄今尚无详实的谱传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而笔者爬梳钩稽诸种正史、文集、笔记、方志、石刻、墓志、年谱、家谱、诗话、词话等文献史料，以年谱形式，对张镃家世、行历、仕履、交游及诗文著作系年等问题进行系统整理与考订，以补史传记载与张镃研究的不足。兹就其生平政事文学之要者略作阐述。

一

张镃曾祖张俊，外祖父刘光世，均是南宋前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其父张宗元登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与朱熹、尤袤等为同年。^④ 绍兴二十三年

① 关于张镃南湖园，南宋祝穆《方輿胜览》、王象之《舆地纪胜》均不见记载，然清代四库馆臣对其方位及得名考证甚详：“南湖一名白洋池，在杭州城北隅。宋张俊赐第，四世孙镃别业，据湖之上。湖在宅南，因名南湖。杨万里、陆游诸人皆为之题咏，而镃亦以自名其集，遂传为古迹”(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67页)。

② 方回《桐江续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2页。

③ 牟巘《题西秦张氏世谱后》云：“张槩仲实撰其祖《忠烈王世谱》……书之至六七世未艾。历官概见于左，而于本宗卒葬特详，尊其所自出，亦苏氏谱法也。王(张俊)字伯英。仲实以槩为名，尝奉父兄之命，复先庙，修家传，又为《世谱》而叙其首，示不忘本。”(《陵阳集》卷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3—144页)可见张槩尝撰张氏世谱，载张俊子孙达六七世，历叙其仕履、卒葬等情况。张镃乃张俊三世传嫡长孙，世谱当有记载，惜谱已亡佚。

④ 见佚名撰《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徐乃昌辑《宋元科举三录》，民国十二年(1923)金陵徐氏景刊明弘治本。

(1153),张宗元除右承议郎、知大宗正丞。^① 张镒即生于是年。张镒出生时,张俊居京师杭州,张宗元也在杭州供职。张镒生平的大部分时间,即主要生活和仕宦于杭州。

关于张镒生平仕履,各种史籍论著所述均不详实。为明其生平梗概,兹略述其重要仕履如下:

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张镒二岁,张俊卒。绍兴二十七年(1157),张镒五岁,朝廷诏周麟之为张俊撰神道碑,时张镒以荫补直秘阁。

孝宗淳熙八年(1181),张镒始通判临安。

淳熙十四年(1187)秋,张镒以疾辞临安通判。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光宗登基,张镒直秘阁,获厕廷绅。

光宗绍熙元年(1190)春,张镒为宣义郎、直秘阁。

宁宗庆元元年(1195)六月,张镒以臣僚弹劾,自司农寺主簿任上放罢。

庆元四年(1198)九月,张镒自司农寺丞任上与宫观。

嘉泰元年(1201),张镒除太府寺丞。

开禧二年(1206)十月,张镒以臣僚弹劾,落奉议郎、直焕章阁,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之职,罢宫观。

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张镒于司农少卿任上追两官,送广德军居住。

嘉定四年(1211)十二月,张镒于奉议郎任上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送象州羁管。

理宗端平二年(1235),张镒卒于象州。

张镒一生经历高、孝、光、宁、理五朝,享年八十三岁。其生平政治活动,基本上可以宁宗开禧二年(1206)五十四岁时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张镒人生前期历除直秘阁、临安通判、司农寺丞、太府寺丞等职,处于孝宗、光宗和宁宗前期这一政治上较为平稳的时代。此期,张镒除了一度以疾辞临安通判之外,仕途较为顺利,没有重要的政治活动。

① 见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686页。

在政局较为动荡的宁宗朝后期,张镃开始参与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活动,其人生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

宁宗开禧二年(1206)五月,韩侂胄用兵伐金。这是宁宗朝乃至整个南宋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张镃对开禧北伐与恢复中原的态度和立场,史书并无正面记载。不过通过今存张镃诗文,可以看出张镃对韩侂胄北伐是抱有厚望的。早在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以韩侂胄招揽,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创秋风亭,赋《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词有“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功成者去,觉团扇、便与人疏。吹不断、斜阳依旧,茫茫禹迹都无”^①,感慨神州分裂的现实。张镃次辛弃疾韵,有《汉宫春》词云:“江南久无豪气,看恢恢意概,当代谁如”^②,称赞辛弃疾规恢意气的同时,抗金复国之意亦跃然纸上。开禧北伐初始,项安世方丁内艰,以韩侂胄用兵起复,知鄂州。张镃赋《满江红·贺项平甫起复知鄂渚》送之,词有“说项无人堪叹息,瞻韩有意因恢复。用真儒、同建太平功,心相属。……看可汗生缚洗烟尘,机神速”^③。韩侂胄起兵北伐不久,南宋淮、汉师即溃,项安世复以韩侂胄赏识除湖广总领,升太府卿。张镃又有《水调歌头·项平甫大卿索赋武昌凯歌》赠项安世,词云:“忠肝贯日月,浩气抉云霓。诗书名帅,谈笑果胜棘门儿。……畅皇威,宣使指,领全师。襄阳耆旧,请公直过洛之西。”^④希望项安世能够不负使命,规恢河洛。

然而南宋北伐不久,金人即由守转攻,宋军很快全线溃败,宋廷不得不筹划与金人和议。金人在形势有利于己的情况下,“要以五事”,即返还俘虏、增加岁币、缚送首谋、称藩、割地(由以淮河为界改为以长江为界)。金人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缚送惩办发动战争的魁首,如果宋人自己惩罚发动

①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六《两浙、铅山诸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1页。

② 《南湖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1页。

③ 《南湖集》卷十,第181页。

④ 《南湖集》卷十,第179页。

战争的魁首,则必须“函首以献”。^①在此情势下,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杨次山、钱象祖、卫泾、王居安等人开始进行谋诛韩侂胄的活动。尽管张镃对南宋北伐与恢复中原寄有厚望,与韩侂胄亦素有往来,但在政治情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他亦参与到诛韩事件之中。宋人叶绍翁记载:“镃始预史(弥远)议诛韩(侂胄),史以韩为大臣,且近戚,未有以处。张谓史曰:‘杀之足矣。’史退……曰:‘镃,真将种也。’心固忌之。”^②周密更详载其事云:“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用兵之谋复起。……于是杨次山与皇后谋……后惧事泄,于是令次山于朝行中择能任事者。时史弥远为礼部侍郎、资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钱参政象祖,尝以谏用兵贬信州,乃先以礼召之。礼部尚书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镃,皆预其谋。……时开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爱姬三夫人号‘满头花’者生辰。张镃素与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饮至五鼓。……初三日,将早朝……甫至六部桥……夏挺、郑发、王斌等,以健卒百余人,拥其轿以出,至玉津园夹墙内,挝杀之。”^③可见,在整个诛韩事件中,从谋划到具体实施,张镃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韩侂胄北伐的是非功过,长期以来史家颇有争议。由于宁宗时期南宋已逐渐走向衰落,宋金实力均衡的客观之势亦没有打破,宋廷并无收复失地的能力,加之韩侂胄确有“立盖世功名以自固”的个人因素^④,因而学者多对韩侂胄北伐持批判态度,但也不乏肯定韩侂胄北伐恢复之举者。^⑤虽

① 参见赵永春《金宋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2—297页。

② 叶绍翁撰;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丙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1页。

③ 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48页。

④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七十四《韩侂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774页。

⑤ 如缪钺认为:“平心论之,韩侂胄执政时,虽然专横跋扈,但毕竟与秦桧、贾似道等卖国投降者不同。他晚年主张北伐抗金,收复失地,因谋划粗疏,招致失败,而其志可谅。”(见《论史达祖词》,载《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又载《灵溪词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8页)陈庆平认为:“韩侂胄去世已七百多年,他个人的名誉与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只是他的是非功过与后人外来入侵时应抱怎样的态度、应有怎样的行动却有很大的关系,于是也就对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有关系了,所以我们是不得不详为论辩的。韩氏虽事功无成,但他一生忠心为国的事迹是无法抹杀的”(见《纠正七百多年来史家对于韩侂胄的错误批判并揭穿当时伪道学派的罪行》,载《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创刊号);又载《金城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142页)。

然史家对韩侂胄北伐多有批判,但对张镃参与诛韩事件也往往持批评意见。如清四库馆臣即云:“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称宁宗诛韩侂胄,镃预其谋……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又称镃本善侂胄,被诛前一日,为其爱妾生日,镃犹携庖夜宴,故侂胄不疑。及赏不满意,复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谪象台而卒。据二书所云,是镃本以机数立功名,有忍鸷之才,而心术未为纯正。”^①这种批判张镃的观点,大概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张镃与韩侂胄素有往来,复又参与诛韩之议;二是有史记载张镃诛韩之后又欲以故智去史弥远,据此认为张镃反覆善变,唯求功名。

事实上,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其一,史载所谓张镃素善韩侂胄,未必如是。因为以张镃的家世、才艺及其久仕临安的经历,他在政界文坛多方交往,实属平常之举。从今存史料及张镃文集来看,张镃交往极为广泛,韩侂胄并非张镃关系之最密者。与张镃一生为挚友者,恰恰是晚年与韩侂胄誓不两立的杨万里和毕生主张恢复的陆游。其二,史称张镃诛韩之后“赍伐自言,史(弥远)昌言于朝:‘臣子当为之事,何为言功?’遂讽言者贬镃于霅,自是不复有言诛韩之功者矣”^②。这一记载唯见于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所论也未必恰当。宁宗朝后期,史弥远尽揽诛韩之功,排斥善类,独擅朝政,倒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是张镃,当时同预诛韩之议的钱象祖、卫泾、王居安等人,很快亦均遭贬斥,足见张镃等人遭到弹劾贬斥,其实是因史弥远专功擅权所致。其三,张镃寄望北伐恢复,复预诛韩事件,二者并无矛盾冲突,实乃时势使然。其四,以张镃的显赫家世、仕履经历及宁宗时期尤其是开禧北伐前后诗词中流露的隐退情怀来看^③,虽然他生活富贵豪奢,却不可一言以蔽之曰资机数博取功名者。

①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南湖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2—1383页。

② 《四朝闻见录·丙集》,第91页。

③ 如嘉泰四年(1204)张镃赋《临江仙》词:“看看云蔽月,三际等空虚。纵使古稀真个得,后来争免呜呼。肯闲何必更悬车。非关轻利禄,自是没工夫”(《南湖集》卷十,第178页);开禧元年(1205)赋《水龙吟》词:“浮生幻境,向来识破,那堪又老。……自古高贤,急流勇退,直须闻早”(《南湖集》卷十,第180—181页)。

关于张镃对北伐恢复的态度,对张镃参预诛韩及其人品的看法,是张镃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却未有定评,诋之者称其心术未纯,誉之者推其近于抗金英雄辛弃疾一派。^①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史家对韩侂胄北伐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对张镃参预诛韩都不必过于苛责,对张镃在特定历史时期声援辛弃疾、项安世等抗金或北伐士人的举动亦应予以肯定。

就在韩侂胄被诛及函首于金的同时,张镃亦未能幸免。开禧三年(1207)张镃自司农少卿任上追两官,送广德军居住。其后一度以旨放还。但嘉定四年(1211)张镃终自奉议郎任上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送象州羁管,于理宗端平二年(1235)卒于象州。以宁宗开禧间参预诛韩为界,张镃在激烈的政治风浪及悲惨的远贬中度过了人生的后期近三十年。

二

在宋室南渡之初,张镃曾祖张俊、外祖父刘光世与韩世忠、岳飞等将领一道,成为辅佐南宋政权抵抗金人、逐渐稳定局势的重要人物。至绍兴年间,南宋“诸大将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惟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军为盛”^②,乃至“沿边之兵,尽归诸大将,帅臣反出其下”^③。绍兴八年(1138),高宗在站稳脚跟之后,认为地方诸将兵势过盛,已成为除金人之外威胁朝廷的又一严峻问题,因此明谕:“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④。同时,张戒、秦桧、范同等朝臣也纷纷献策,建议分诸将兵势,集权于朝廷。于是,朝廷开始收缴诸大将兵权。在此情况下,张俊对高宗、秦桧等人的意图心领神会,于是率先妥协,向朝廷交出兵

① 如陶尔夫、刘敬圻认为,张镃“是同辛弃疾唱和最多的词人之一”,“南宋的安危经常系念于心头”,“豪壮昂扬的词作,与辛弃疾、陈亮的词风是相近的”。见《南宋词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43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14—1815页。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十八,第1904页。

权,并赞同高宗、秦桧与金人的和议之谋。史载,“(张)俊晚年主和议,与秦桧意合,上(高宗)眷之厚,凡所言,朝廷无不从”^①。因此,在高宗、秦桧君臣进行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张俊不但没有像岳飞等人那样受到迫害,反而得到高官厚爵,进一步攀升,张俊家族也由此崛起,在南宋前期长盛不衰。张镒就出生于这样一个显赫富贵的家庭。其文集中便多有感叹自己家世的作品。如《次叔祖阁学暑中过清寒堂韵》:“我家忠烈定社稷,任大岂但惩与膺……强敌坐致九顿首,和议姑随三折肱。至今耆旧话曩昔,白发相对搔鬢髻”^②,将其曾祖张俊始抗金敌,后又附随和议而发迹的历史和盘托出。《表兄刘东玉提干挽诗二首》其一则云:“王祖扶天日,同声外氏翁。功勋俱卓越,门户合穹隆”^③,对张俊、刘光世等祖辈的联姻结盟及其功勋深感荣耀。正如张镒《南园叔祖生日》所云:“绍兴元勋如日悬,承家有人光后先”^④,到张镒的父辈,张氏家族仍然深受朝廷的眷顾。高宗曾亲笔书“德勋”二字,作为张镒父亲张宗元的寝堂之名。张镒即回忆说:“往事追思重惨伤,相从常醉德勋堂。”^⑤至孝宗淳熙年间,在朝两任宰相的史浩也赠诗张镒说:“英英尊府分符誉,烨烨先曾卫社功。”^⑥可见,张氏家族长期蒙受赵宋皇室恩宠,显贵不减当年。

张氏家族本已显赫一时,至张镒生活的时代,他又进一步大规模扩建自己的私家园林。宋人周密录张镒《玉照堂梅品》云:“淳熙岁乙巳(1185),予得曹氏荒圃于南湖之滨,有古梅数十,散漫弗治。爰辍地十亩,移种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别圃江梅,合三百余本,筑堂数间以临之。又挟以两室,东植千叶绀梅,西植红梅各一二十章,前为轩楹,如堂之数。花时居宿其中,环洁辉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第2255页。

② 《南湖集》卷三,第45页。

③ 《南湖集》卷四,第61页。

④ 《南湖集》卷三,第34页。

⑤ 参《南湖集》卷八,第140页。

⑥ 参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三十六,《宋集珍本丛刊》第4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83页。

映,夜如对月,因名曰玉照。复开涧环绕,小舟往来”^①。张镒《桂隐纪咏》诗序又云:“淳熙丁未(1187)秋,仆自临安通守,以疾丐祠。既归桂隐,遂捐故庐为东寺,指新舍为西宅,南湖以经其前,北园以奠其后,因枚立堂、宇、桥、舟诸名”^②。张镒《桂隐百课》自序亦载:“淳熙丁未秋,余舍所居为梵刹,爰命桂隐堂馆桥池诸名,各赋小诗,总八十余首。逮庆元庚申(1200),历十有四年之久,匠生于心,指随景变,移徙更葺,规模始全”^③。再据《桂隐纪咏》组诗及《桂隐百课》所记,可考自孝宗淳熙至宁宗庆元年间,张镒捐出杭州北郊南湖的故居为寺院,然后仍以南湖为中心,历时十几年,重建宅居和各种亭台池阁,景致共达八十余处。张氏家族长期的显赫繁荣,已使张镒甚受世人瞩目,他在延续家业之余,又在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杭州不断构筑庞大富丽的私家园林,供自己和亲友生活游乐,宴饮唱酬,更令他备受时人青睐,为其政治与文学活动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同时,张镒甚有才艺,又非常好客,喜欢游意风雅,与人吟诵唱和,因而在当时声名远播。周密称其“有吏才,能诗,一时所交皆名辈”^④。元代夏文彦亦称其“清标雅致,为时闻人,诗酒之余,能画竹石古木,字画亦工”^⑤。张镒极富诗情,喜吟成癖。他自称:“我固有诗癖”^⑥。又说:“我因耽诗鬓如丝”^⑦，“一日不觅句,更觉身不轻”^⑧。独处之际,他常常是“坐禅才罢即行吟”^⑨。若友人来访,他则往往与之“登楼才会面,促坐便论诗”^⑩。有时,他甚至会对朋友说:“若无诗与酒,不请看花来”^⑪。其《因过田倅坐间,得姜尧

① 《齐东野语》卷十五,第274页。

② 《南湖集》卷七,第111页。

③ 《南湖集·附录上》,第197页。

④ 《齐东野语》卷十五,第276页。

⑤ 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6页。

⑥ 《南湖集》卷四,第53页。

⑦ 《南湖集》卷二,第23页。

⑧ 《南湖集》卷三,第44页。

⑨ 《南湖集》卷五,第77页。

⑩ 《南湖集》卷四,第51页。

⑪ 《南湖集》卷七,第117页。

章所赠诗卷,以七字为报》即称,他与姜夔的交往,“应是冰清逢玉润,只因佳句不因媒”^①。《谒陆礼部归偶成二绝句》其二称他与陆游“相投无过只谈诗”^②。可见,文学创作是张镒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极富才情,甚喜吟诵,又成为他广泛交游的重要个人基础。

显赫富贵的家世与满腹的才情,使张镒广为时人关注,在文坛具有重要地位。我们可以从杨万里的一段记载,看到当时文人墨客多乐意与之交游的心理。淳熙十六年(1189)杨万里作《约斋南湖集序》云:

初,予因里中浮屠德麟,谈循王之曾孙约斋子有能诗声,余固心慕之。然犹以为贵公子,未敢即也。既而访陆务观于西湖之上,适约斋子在焉。则深目顴颧,寒眉臃膝,坐于一草堂之下,而其意若在岩壑云月之外者。盖非贵公子也,始恨识之之晚。^③

杨万里所说的“约斋子”即是张镒。通过诗坛大腕杨万里对其未见时“固心慕之”,然“未敢即也”,及见又“恨识之之晚”的态度,可见张镒在时人心目中极高的地位以及时人对他的趋慕。

张镒的文坛地位,不仅由于他个人的家世、才情与诗声文名,更在于他在文坛广泛的交游唱酬活动及其对于推动当时文人的交流与创作所做出的贡献。方回《读张功父南湖集》诗序称张镒“尽交一世名彦”,其诗又云:“生长勋门富贵中,秣糠将相以诗雄。端能活法参诚叟,更觉豪才类放翁……镂金组绣同时客,合向南湖立下风”^④。方回不仅说明了张镒生于功勋豪门的家世,肯定其比并杨万里、陆游而擅雄诗坛的才艺,而且指出他喜好招徕四方英士集于南湖而高会的性情。深入考察张镒的活动与创作,即可发现,他在文坛确实极为活跃,交游异常广泛,其所居的南湖成为当时文人雅士诗文交会的胜地。宋元之际,戴表元《牡丹宴席诗序》载:

① 《南湖集》卷六,第95页。

② 《南湖集》卷七,第126页。

③ 《杨万里集笺校》卷八〇,第3251页。

④ 《桐江续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303页。

渡江兵休久，名家文人渐渐修还承平馆阁故事，而循王孙张功父使君以好客闻天下。当是时，遇佳风日，花时月夕，功父必开玉照堂置酒乐客。其客庐陵杨廷秀、山阴陆务观、浮梁姜尧章之徒以十数，至辄欢饮浩歌，穷昼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酬诗或乐府词累累传都下，都下人门抄户诵，以为盛事。^①

可见，杨万里、陆游、姜夔等文坛名家，均是张镒的座上常客。不仅如此，如朱熹、陈傅良、吕祖俭、彭龟年、蔡幼学等著名的道学之士，也成为张镒的席上之宾。如朱熹《跋鲁直书践祚篇》云：“绍熙甲寅闰十月十日，钱范文叔于张功父南湖之上。功父出此为赠”^②。陈傅良《张园送客分韵诗序》载：

张园送客分韵诗，为常信二史君（指石叔访、黄商伯）作也……同院若同僚若同年家又十人饯之张园……十人者，会稽黄文叔，清江彭子寿、章茂献，永嘉薛象先、蔡行之，蜀范文叔，临川曾无逸，章贡李和卿，东莱吕子约与余也。会张功父致地主之意，亦分一韵。^③

可见，张镒位于杭州城北的私宅南湖，经常是名士云集，甚至一次性就多达十余人，他们或艺文往来，彼此酬赠；或置酒论诗，群起唱和。

正如张镒《又呈坐客》诗所云：“天假南湖一段奇，宾朋胥会只论诗……从来邂逅宜真率，花下杯传却莫迟”^④。张镒以其独特的家世与才情，坐镇京都的南湖，以文会友，招徕四方名士，他们的即席诗词作品常是门抄户诵，广为流传，成为文坛盛事。这种情况，在整个宋代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对于推动南宋中兴期文人之间的广泛交流，促进他们的文学创作与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张镒也因此文坛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成为认识南宋中

① 戴表元《剡源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3页。

② 朱熹著；曾抗美等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三，《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24页。

③ 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四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 《南湖集》卷六，第96页。

兴期文学生态和文学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具有特定的文学史意义。

三

在宋代诗学史上,北宋初期是唐风一统天下,至南宋初期,又是江西诗学独占鳌头。到了南宋中兴期,则是诗坛批判继承唐风和江西诗学而走向创新独造的时代。张镃的诗学思想,即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诗史发展的轨迹。换言之,在南宋中兴诗坛上,张镃也是与友人杨万里、陆游等人一道推动新的诗学思潮发展演进的重要成员之一。

一方面,张镃主张转益多师,广学古人。其《俞玉汝以诗编来因次卷首韵》称:

我生癖耽诗,极力参古意……大雅既不作,少陵得深致。楚骚久寂寞,太白重举似。堂堂豫章伯,与世不妩媚。峭峭后山老,深古复静丽。长篇杂短章,末学敢睥睨。愧非四公者,孰毕此能事。^①

张镃表明了“极力参古意”的诗学立场,进而以杜甫、李白、黄庭坚、陈师道等“四公”为具体榜样,赞扬杜甫得大雅之深致,李白举楚骚之精神,推许黄庭坚诗不媚于世的气格及陈师道诗的深古与静丽。其《题尚友轩》云:

作者无如八老诗,古今模轨更求谁。渊明次及寒山子,太白还同杜拾遗。白傅东坡俱可法,涪翁无己总堪师。^②

在此,张镃又标举出陶渊明、寒山、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八老”,认为他们皆可师法。可见,张镃的诗学主张,极富包容性,恰好囊括了中国诗学史上富有成就与特色的部分:先秦时期的大雅、楚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唐代的杜甫、李白和白居易,宋代的苏轼、黄庭坚与陈

^① 《南湖集》卷一,第12页。

^② 《南湖集》卷五,第75页。

师道。他不仅诗学取向广泛,而且深悟自先秦至唐宋中国传统诗学之精髓。

当然,在张铤所说的“四公”、“八老”等前辈诗人中,他也有所侧重,他尤为推许的是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其《杂兴》之二十一云:

唐家盛词华,培本自武德。投戈辟文馆,英士来翼翼。访政讨
典坟,分夜亡倦极。当时瀛洲目,意气宁偃仄。言诗到李杜,骚雅
并区域。^①

张铤认为唐代虽然词华称盛,但唯有到了李白、杜甫,方为极盛,因为李、杜诗能够追本溯源,入骚雅之域。其《读乐天诗》则云:

诗到香山老,方无斧凿痕。目前能转物,笔下尽逢源。学博才
兼裕,心平气自温。随人称白俗,真是小儿言。^②

张铤赞许白居易诗浑融圆转,无斧凿之痕,而且才学富赡,左右逢源,批判那些称白诗俗者乃小儿之言,对白居易极力维护。他也模拟白居易的诗体进行创作。如《戏效乐天体》:

去日不可再,来日焉可虚。直待百事足,漫把四大拘。黄河几
曾清,白发莫旋乌。全福贵安然,真乐难强图。朴直自许我,才能
不如渠……意均饱暖适,迹或升沉殊。达人旷大观,万象归一
途。^③

诗中的富闲之气与旷达之趣,可谓深得白居易闲适诗三昧。

张铤还学习孟郊、贾岛的苦吟为诗。其《次韵寄斋赠竹居》云:“振俗还风雅,乾坤觅句中。夔皋渠合遇,郊岛我甘同。”^④他甚至对韩偓的香奁体诗也要尝试学习。其《戏仿韩致光体》云:“意嫌风前侧帽檐,落梅红在麦修纤。归家说尽单行处,可奈温香翡翠奁。”^⑤可见,张铤对前人的学习确实是

①《南湖集》卷一,第5页。

②《南湖集》卷四,第50页。

③《南湖集》卷一,第14页。

④《南湖集》卷四,第60页。

⑤《南湖集》卷八,第152页。

多方面的。其诗学追求,与单一取径黄、陈的江西诗派末学迥然异趣,也非仅仅是回归唐风。这种诗学取向,在江西诗风流弊丛生的南宋诗坛,无疑具有以古为新的创新意义。

另一方面,张镃追求活法悟诗,独造平淡。所谓“活法”,是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意思是要诗人又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达到一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① 在南宋中兴时期,杨万里、陆游等人在江西诗风长期笼罩诗坛的局面下,继承了吕本中的活法理论,对江西诗学进行革新。张镃与杨万里、陆游等人交游唱和极为密切,他除了从前代作家那里广泛吸取诗学营养,也呼应了杨万里、陆游等人创新求变的时代精神,注重就近学习时人诗学理论中富有新意的部分,并力求深造自得,成为反拨江西诗风,推动宋诗发展的积极因素。

张镃对江西诗学转变期的重要诗人曾几甚为欣赏。他说:“江西源正非旁流,文清诗名不易收。师承吏业特余事,一门玉律夸中州”^②。又云:“共推掌学文清手,突过谈兵杜牧才……诗章活法从公了,要使诸方听若雷”^③。曾几,号茶山,谥文清。时“居仁(吕本中)诗专主乎活……茶山倡和求印可,而居仁教以诗法,故茶山以传陆放翁”^④。曾几学诗法于吕本中,又是陆游的老师,“风格比吕本中的还要轻快,尤其是一部分近体诗,活泼不费力,已经做了杨万里的先声”^⑤。张镃推重曾几,正是因他认为曾几作为江西诗派后期代表人物,与倡导活法理论的吕本中一道,对江西诗学弊端进行改造,为推动南宋诗风的转变导夫先路。由此,亦可看出张镃本人崇尚活法的诗学追求。

在中兴诗人中,张镃最为推崇的是友人杨万里,他认为杨万里是活法悟

① 参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79页。

② 《南湖集》卷三,第36页。

③ 《南湖集》卷六,第94页。

④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诚斋律髓汇评》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24页。

⑤ 《宋诗选注》,第141页。